

抗战风云录

KANGZHAN FENGYUNLU

——成都八年抗战史料简编



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

中共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

成都时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抗战风云录/中共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抗战风云录》
编委会编. —成都: 成都时代出版社, 2005
ISBN 7-80705-046-2

I. 抗... II. 中... III. 抗日战争—史料—成都市
IV. K26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41916 号

责任编辑: 朱云徽

封面设计: 刘树龙

封面题字: 沈 利

责任校对: 戴 维

抗战风云录

——成都八年抗战史料简编

中共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抗战风云录》编委会编

成都时代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市庆云南街 19 号 邮编: 610017)

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市金牛区白马印刷厂印刷

850mm × 1168mm 32 开 8.75 印张 210 千字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ISBN 7-80705-046-2/K·6

定价: 29.80 元

电话 (028) 86619530 (综合类) 86613762 (棋牌类) 86615250 (发行部)

《抗战风云录》编辑委员会

编辑委员会：张鹤鸣 沈 利

熊淑懿 岳建功 刘 海

主 编：张鹤鸣

副 主 编：刘 海

编 辑：刘树龙



成都各界民众抗日救亡团体组织的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游行



1937年七七事变次日，进步社团“天明歌咏团”在春熙路教唱救亡歌曲



成都各民众团体在少城公园举行宣读抗敌公约大会



四川青年在街头进行抗日宣传



成都各界救国联合会下乡宣传队在赴天回镇途中



成都各界救国联合会下乡宣传队在赴天回镇途中



1938年6月，世界学联代表团成员与中共成都市委书记韩天石等人的合影（左起：周曼如、郭号、胡绩伟、美国代表雅德、张涤生、韩天石、邓照明、英国代表柯乐满、张文澄）



1938年3月，以成都民先队负责人肖玲为团长的“四川妇女战地服务团”战士出征前合影



1939年春四川大学抗敌兵役宣传团在灌县（今都江堰市）



五大学基督教乡村服务团到温江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目 录

序言	邓 川 (1)
成都八年抗战概述	(1)
成都抗日民主斗争大事记	(17)
关于抗战前后成都青年运动和党的重建的一些情况	韩天石 (46)
1938 年成都市委工作点滴回忆	张 宣 (51)
抗战初期成都市委组织的恢复和抗日救亡活动的一些情况	侯方岳 (55)
抗战初期我党在成都的国际统战工作片断回忆 ...	朱若华 (60)
我奉派做团结刘文辉的工作	张友渔 (66)
成都和川大学生运动的情况	邓照明 (77)
记华西坝五大学学生抗日救亡运动	潘清雍 (100)
成都市工人抗敌宣传团概况	成都市总工会工运史组 (113)
成都战地服务团出川纪事	沈果正 (121)
在《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处工作的日子里	潘健萍 (127)
白色恐怖下的《新华日报》川西北总分销处	
.....	成都市档案馆 (131)

中共地下党员在成都美国新闻处图片部的秘密活动

.....	朱文质 (135)
抗战初期的成都文化界救亡协会	洪沛然 (139)
关于“川大稻草案”的回忆	王怀安 (143)
回忆 1940 年成都“抢米事件”	郑伯克 (157)
成都大中学生声援“市中事件”始末	王宇光 (164)
1944 年的成都国事座谈会	
.....	四川医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党史组 (174)
抗战时期成都的话剧	陈 铮 李恩琪 (184)
记旅外剧队	戴碧湘 (188)
日本帝国主义空军轰炸四川的罪行	吴嘉陵 (212)
义勇军敢死队成都第一队出川抗日情况	葛诗雄 (226)
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潮中的成都事件	于建章 (240)
编后记	(262)

成都八年抗战概述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中共中央于7月8日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后，成都人民没有忘记“九一八”血写的历史，更没有忘记1936年反对日本强行在成都设立领事馆的斗争。日寇炮击卢沟桥发起新的侵略战争，人民把仇恨变成高昂的爱国热情，摩拳擦掌，同仇敌忾，为抗战奔走，为救亡呼号。抗日救亡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北平、天津、上海及沿海城市相继沦陷后，数十家工厂和十多所大、中学校内迁成都，文化界许多爱国人士会聚蓉城，使成都的救亡运动以崭新的战斗姿态汇入全国抗日救亡洪流。

抗战开始后，除共产党员韩天石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都队、共产党员饶孟文领导的“进社”等继续积极开展救亡活动外，由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自动组织的“成都工人抗敌工作团”（1938年后改为“成都工人抗敌后援会”）、“成都市妇女华北抗敌后援会”（同年8月改为“四川省妇女抗敌后援会”）、“四川青年救国会”、“成都市文化界救亡协会”、“成都市回教抗敌后援会”等各界群众抗日救亡团体相继成立。

1938年，在中共四川省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省工委”）和中共成都市委员会（以下简称“成都市委”）领导下，成都风起云涌的救亡运动同全国的救亡运动和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斗争密切联系起来形成新高潮，进入了新阶段。2月13日，为响应伦

敦召开的国际反日援华特别会议，党发动各救亡团体参加反侵略火炬大会。会后，各界民众万余人及国际友人陆德礼、高宝谨、魏路诗等参加火炬游行；“成都市文化界救亡协会”发表反侵略《宣言》，号召文化界人士支持政府对日全面抗战。3月，省工委派学委委员张文澄率成都学生代表团出席3月25日在武汉召开的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此后，成都学生运动按学联二大会议精神和二大对成都学生的要求，朝着“实现成都学生大团结”、“扩大宣传工作”、“开展救护工作”的方向，积极开展工作，成都救亡学生成为全国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中一支生力军。

抗战开始，党掌握的《四川日报》、《国难三日刊》、《时事新刊》、《民声报》和受党影响的《华西日报》、《新民报》及抗日救亡团体先后创办的《图存》周刊、《星芒》周刊、《救亡》周报、《战时学生旬刊》等，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揭露日寇的侵略罪行，激发群众的爱国热情和启迪群众自觉投身抗日救亡的觉悟，起到为抗日救亡呐喊和党的喉舌作用。1937年7月9日，《四川日报》在题为《为二十九军英勇抗战谨致民族的敬礼》的社论中指出，“国家民族已届生死关头”，呼吁“救亡图存，自今日始”。8月28日《国难三日刊》在发刊词中尖锐地揭露日寇造成我“领土的国难”、“政治的国难”、“经济的国难”等罪行，并且主张“持久的、彻底的抗战”。7月9日，文化界知名人士车耀先在《图存周刊》上以《抗战！抗战！抗战！》的醒目标题发表社论，呼吁抗战到底。

1938年4月，在中共中央派到四川做上层统战工作的罗世文的领导下，《新华日报》推销组在祠堂街103号（后迁至88号）建立，8月扩大为推销处，1939年4月设立《新华日报》成都分馆（川西北总经销处）。分馆除发行《新华日报》外，还经销党刊《群众》和毛泽东等党的领导同志的著作。分馆在中

共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一直坚持到1947年3月才撤回延安。《新华日报》像黑夜中的一盏明灯，许多群众尤其是青年学生从中深受教育，走上革命道路。战时出版社、读书生活出版社成都分社、莽原出版社等，除出版发行本版图书外，还销售《大众哲学》、《新哲学大纲》及茅盾的《子夜》、高尔基的《母亲》等进步书籍。1940年9月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形势十分严重，当年10月，读书生活出版社成都分社在党支部领导下，冲破了国民党特务的“查禁”，十分巧妙地公开发行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使蓉城群众进一步了解了党的抗日主张。生活书店成都分店、新知书店成都分店、开明书店成都分店、益民书店、北新书店、儿童书店等进步书店除经销一般书籍和文化用品外，还经常发行由延安运来的马、恩、列、斯著作和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著作，以及《群众》、《解放日报》、《大众哲学》、《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书刊。

成都的救亡团体纷纷组建宣传队伍，以歌咏、街头剧、壁报、戏剧、漫画、木刻等多种文艺形式，深入城乡广泛开展救亡宣传，吹响抗日救亡的号角。天明歌咏团在抗战爆发后的第二天下午第一个走上街头，用歌声声讨日寇的侵略罪行，唤醒民众立即投入抗日救亡。他们同以书店店员为主的晨呼队和邮电职工组成的海燕歌咏团走遍市内大街小巷，开展歌咏宣传活动，并常在国民党办的广播电台播唱或教唱救亡歌曲。成都工人抗敌宣传团、星芒抗敌宣传团、大声抗敌宣传团、群力抗敌宣传团、大众壁报抗敌宣传团等在市内或市郊场镇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四川漫画社举办“救亡漫画展”，中华木刻工作者协会举办抗战木刻画展。

戏剧界以戏剧为武器，使救亡宣传有声有色。1937年9月1日，抗敌话剧团公演《保卫卢沟桥》，观众达三四千人。由戏剧家夏云瑚率领的影人剧团，剧作家熊佛西主持的抗战剧团，戏剧

家王肇裡、吴雪率领的四川旅外演剧队等相继入川，演出的《塞上风云》、《流民三千万》、《卢沟桥之战》、《古城怒吼》、《三江好》等，催人泪下，激发了民族感情，给人以战斗的鼓舞和胜利的信心。

一批青年作家和爱好写作的青年，创办通俗文艺刊物，反映前线和后方抗日场面，揭露敌人丑恶嘴脸，介绍国际反法西斯斗争情况。1939年2月13日，由作家叶圣陶、牧野主编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会刊《笔阵》，以大量篇幅反映抗战和人民同日寇斗争到底的决心。还有《通俗文艺五日刊》、《战旗》旬刊、《战潮》半月刊、《文艺后防》、《工作》半月刊等都积极宣传抗日，作家何其芳的诗《成都，让我把你摇醒！》就发表在《工作》半月刊上。成都进步青年相继创办的《金箭》月刊、《星芒》报、《救亡》周刊等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金钱板、演义、小小说、相声、评书、漫画等形式，表现抗日内容，受到群众喜爱。1938年3月12日，各界群众热烈欢送以成都民先队负责人肖玲为团长的“四川妇女战地服务团”11人，赴安徽青阳、木镇抗日前线做战地服务工作。她们被《新华日报》称为“都是最年轻的抗日战士”。她们在抗日前线，不畏艰险，努力为川军服务和做统战工作、群众工作等，成绩突出，受到当地群众的赞扬。

在中共坚持全面抗战路线的影响和群众抗日救亡热潮的推动下，川军将士的爱国热忱被大大激发，纷纷致电上书，请缨杀敌，共赴国难。时任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兼四川省主席的刘湘，也积极主张抗战，1937年7月17日电请蒋介石早定抗战大计；在8月7日蒋介石召开的最高国务会上，他又表示愿意率领川军出川杀敌。9月5日，成都三千余民众在少城公园举行“欢送出川抗敌将士大会”，并把绣有“抗敌先锋”四个大字的锦旗献给出川的10万川军将士。1938年5月22日，10万市民再次举行欢

送川军将士出川的授旗仪式。川军出川抗日的壮举，正如 1937 年 8 月 29 日《国难三日刊》短评所说：“川军健儿，出川参加国际战争，与日本帝国主义者作正面的冲锋陷阵，是为历史之创举。”9 月 5 日，“成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致川康出征军人书》中称赞说：“我们的军队现在真正为了我们大家出川拼命了。”

这些出川抗日的勇士、爱国青年，辞父母，别故乡，勇敢地奔赴抗日前线，抗击日寇侵略，保卫国家，是成都人民支持抗战的爱国行动，是蓉城的光荣。

刘湘率军出川抗战及其死后，蒋介石中央势力为控制四川，与地方实力各派围绕着争夺省府职位展开激烈的角逐。对这一新的复杂情况，毛泽东主席亲自致电刘湘的代表王干青（共产党员），指出要以大局为重，加强内部团结，坚持抗战。在党的统战工作影响下，地方实力派抵制了国民党中央委派张群入川主政。但是，由于国民党中央势力的强烈干预，省府权力先后落入右翼势力政学系的四川省府秘书长邓汉祥（邓鸣阶）和倾向国民党中央势力的王缙绪手中。他们怕高涨的群众救亡运动对其统治不利，勾结国家主义派、复兴社、CC 派等政治势力，先后制造了“川大稻草案”、“郫县事件”、“星芒报事件”等，并在 1937 年底至 1938 年上半年，强令停止“四川省抗敌后援会”的活动，解散“成都文化界救亡协会”，查封《国难三日刊》、《大声》周刊等进步报刊，仅 1938 年 8 月 12 日，成都市政府就下令查禁抗战文艺刊物 28 种，形成一股逆流，使救亡运动受到冲击和阻碍。省工委和成都市委发动进步力量公开予以揭露，并争取地方实力派的支持，斗争取得胜利，一度低落的救亡运动又继续轰轰烈烈地展开，直到 1939 年上半年。

1939 年 1 月 2 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揭露、抨击汪精卫之流的民族叛贼对抗战前途丧失信心的亡国论调之后，成都连

续开展了声讨汪精卫投敌叛国罪行的运动。16日，成都党组织发动15个救亡团体联合向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提出加紧肃清汉奸、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29项建议。《新民报》等进步报刊杂志纷纷发表评论，一致谴责汪精卫的叛国罪行。“成都市青年抗敌协会”、协进中学相继致电国民党政府，要求通缉汪逆归案究办。5月1日党发动“成都工人抗敌宣传团”组织各业工人举行五一劳动节纪念大会，声讨汪逆叛国罪行。9月1日和9月16日，分别举行了成都记者节大会和印刷工人捐款支援香港反汪罢工工人活动。9月18日，10万市民举行“九一八”纪念和讨汪宣传大会，通电声讨汪逆。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召开，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对内政策由联合抗日转变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大暴露。在“溶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指导下，国民党顽固派相继在博山、深县、平江、确山等地制造了严重的反共流血事件。是年底至1940年春，公开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全国形势开始逆转。为镇压成都不断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破坏中共成都地方组织，逼迫四川地方实力派反共，1940年3月14日，国民党顽固势力有计划地在成都制造了震惊全川的“抢米事件”，逮捕并杀害了《时事新刊》编辑朱亚凡（共产党员），逮捕了《新华日报》成都分馆负责人罗世文、经理洪希宗、著名文化界人士车耀先等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数十人。16日又捣毁了《新华日报》成都分馆营业部。接着党掌握的《民声报》被查封，战时出版社负责人、图书业党支部书记杨道生，川大农学院共产党员罗贤举先后遭逮捕。

针对这一系列的反共阴谋活动，党及时予以揭露。3月14日，中共南方局指示中共川康特委以“中共成都市委”的名义，在成都、重庆、西安等地散发《中国共产党成都市委员会为成都抢米事件真相告成都同胞及全川同胞书》，4月5日《新中华